

文学教育重在塑造人格

王敏 刘维笑

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文教育的一种形式，文学教育往往侧重于培养审美鉴赏、情感共鸣与创造能力，是一种富有情感的知识传递。在叶圣陶先生看来，“人是生来就怀着情感的核的”。正因如此，文学教育应当饱含真情实感，是一种能够唤起人的审美意识和情感共情能力的教育，是一种对生活与社会现实的理性认知，更是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相互碰撞、激发、佐证的过程。在此基础上，文学教育更要主动服务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和文化繁荣发展新需求，切实提升受教育者的家国情怀、文化素养、法治意识和道德修养等综合素质。

涵育美德情操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有言：“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这两句话透露出的正是中国传统教育重视培养人的道德情操的特点。而文学教育在对人的道德培养方面的功用，要经由审美层面上升至道德完善的层面。这一提升的基础是生动的文学作品、鲜活的文学人物。通过引人入胜故事情节，演绎反映美德的主题，从而开掘出对阅读主体而言巨大的美德感召力量。

具体而言，这种美好道德情操的培养，是通过让学生在接受文学教育的过程中，移情于文学作品的人物，继而由作品中人物形象的美德对其加以引导而得以实现的。文学教育及其内含的诗教传统，恰似一种寓教于乐的道德教育，通过阅读主体的移情反应达到平衡理性和感性的目的。

文学教育通过引导学生对作品的品读，进而让他们在跌宕起伏故事情节中，将情感寄寓在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上。他们通过对作品中人物或悲悯或恐惧的情感宣泄，继而达到自身情感的释放与净化。正因如此，文学教育才能使使学生收获轻松舒畅的快感，同时在道德上受到启迪教育，进而获得身心的和谐。

提及文学教育对人的道德及人格塑造方面的功用，梁启超先生的言说可谓精辟。他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指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先新小说。”意思是变革文学的形式与内容，变革文学教育是树立新的道德规范的有效途径。文学教育对道德塑造的功用可见一斑。

当下，科技突飞猛进，信息多元的生活愈加纷扰、喧嚣，也让人有身陷选择之中的烦恼。不以工理性著称的文学，恰好能为焦虑、躁动的人提供得以诗意栖居的文化空间，为真善美性情的滋养提供养心安静之处。文学教育关键在于“立人”。文学的研习与其他学科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潜移默化地陶冶道德修养、培养精神人格。而今，在科技蓬勃发展的时代，中国传统教育这种富含伦理价值的优良传统更不应被遗忘与抛弃。

唤起共情能力

叶圣陶先生在探讨文学创作及文艺理论时曾坦言：文学是人生的表现，而人则可以借助文学得以更好地认识人生，继而提升自身的人格境界。在他看来，文学教育可以让学生获得实际生活所需的知识，还可以澡雪精神，培养学生的直觉、情感和想象。两方面的功用则共同指向对理想人格的塑造。

文学教育的终极目的与意义是指向人的精神领域，以建构高尚、和谐的精神世界为大任。这种对人的心灵世界的关怀，虽然是内隐性的，但要实现这一心灵关怀，则需要借助文学作品中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和历史文化来达成。正如鲁迅先生以刀笔刻画出“铁屋子”般的旧社会，进而对千百年来禁锢国民的封建文化进行批判，意图带给人惊骇、震撼的情感反应，达到唤起民众、匹夫有责的社会功用。这种经由文学作品反映的社会现实与历史文化，所带来的教育效果均指向审美，指向振兴中华民族精神层面的共情。

人文素养不同于自然科学知识的积累，它的内涵相较而言更为丰富，涵盖了情感道德、语言能力、精神领悟等方面。这些元素的平衡和协调发展，对人的审美及共情能力的培养至关重要。而文学教育恰巧可以完成对人文素养潜移默化的培育。人自出生以来就有喜怒哀乐，更有向善、向美、向真的渴求。这种渴求一旦在文学中找到对应的触动，人心中的柔软之处、温暖之处、神伤之处等都能得到情感的慰藉与安抚。恰如王国维先生所说的，胸中恍惚不可捉摸之意境，借由文学艺术得以发挥，进而收获难以比拟的心灵满足。这种心灵满足想要在文学教育中实现，就应如朱自清先生所主张的，进入文学的世界，想文学人物之所想，感他们之所感，要把自己摆进去，“烧”进去，不能“隔岸观火”。如此，才能经由文学世界中的社会生活和历史文化，走向主体审美与情感共鸣。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趋势，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新浪潮风起云涌，文学教育势必要发挥知识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教育特点，不仅要关注人与社会、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更要关注人与自身精神世界如何自治。文学负载着深沉的生命意识与使命感，历来以构筑人的精神、升华人的思想、塑造人的品格而存在。文学教育从根本上而言，旨在提高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识和共情能力，任何时候都应该是教育的重中之重。



本版图片来源：百度

如何恰当书写历史

祝勇

这些年，我一直在文学与历史之间游弋。以我个人的偏见，历史是文学的最大宝库，它藏品丰富，丝毫不逊于现实生活。

我寻找着书写历史的最恰当的方式。这些作品包括《纸天堂》《1894，悲情李鸿章》《辛亥年》等。说它们是散文，却有着比散文更大的包容力，如蒋蓝所说，写作者“调动的人类学、考古学、神话学、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影像学等学科逐渐进入文学境界”，这无疑是一种规模庞大的综合性的写作；说它们是报告文学，却又注入了更多的情感、判断、思考，具有鲜明的“私人写作”性质。也有人以一个新的名字为它命名——“非虚构”。我却更愿意用自己的词来涵盖我的写作——“历史写作”。我写的不是历史，而是历史中的人。历史只为人的活动提供了一个时空的框架，而我所关注的，是在这个框架中的人的命运抉择、进退取舍、彷徨挣扎，是“在个体生命与连续流动的历史关系中，探寻历史运行过程中个体生命的‘踪迹’”。实际上，怎样为这种写作定义并不重要，因为所有这些称谓都有一个共同的核心，那就是对于历史的人文关怀。

历史写作是具有文学性的，因为历史本身就蕴藏着通往文学的秘密通道。“不管是‘真实的历史’还是虚构的故事，它们最终都与人类的时间经验联系在一起，而时间经验其实就是人的生存经验，并因此都是‘真实的’，都可以纳入到人生经历的整体结构中。”我们从文学中看到历史，我们也同样能够从历史中看到文学。

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文学作品《诗经》就是一部历史之书、一部悠长抒情的史诗，它的价值不仅在于为

那个时代的政治与社会提供了一份“客观”的证词，更在于它是来自情感世界的“主观”的表达。历史不是一个先验存在的、不可动摇的固体，不是被囚禁在博物馆里的文化标本，甚至不是历史资料中的僵硬文字，它是活的，有血肉、有呼吸、有语言、有情感，历史的戏剧性往往连天才的剧作家也想象不出来。所以，有评论者认为历史写作不过是对历史资料的抄袭，的确有这样的写作者存在，但他们代表不了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写作。

英国历史学家卡尔说：“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问答交流。”文学，正是问答交流的基本方式。因此，对历史的书写，并不是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只是用一个录音机播放历史的“原声”，实际上，历史的“原声”是不存在的，所有的历史都是讲述中的历史，即话语历史，“历史是被人经历的历史，所有的历史事件都是与人的生存相关，并因此不具有自在的性质。它们一开始就被讲述，而且始终被讲述”。而对历史的书写，并不是对历史的被动模仿，而是对历史的再创造、再塑形，如果没有达到这一要求，历史写作就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

从历史的角度看，历史人物所有的命运都已经成定局，成为历史教科书上的结论，无法改变。然而，当我们借助文学的工具深入到他们多元、复杂、幽深、纠结的内心世界，才会发现他们的命运中潜藏着深刻的不可预测性。

历史写作的神秘性令我深深痴迷，在未来可以预见的光中，我仍然会沉潜于这种写作，发现历史的宏大叙事中被我们忽视的幽暗角落，寻找人性的宝贵闪光。

历史人物传记的“骨骼”

——《王安石传》写作启示

王松

打开崔铭的《王安石传》（天津人民出版社2021年10月出版），眼前一亮。我很难用一个文体定义它。它既是一部历史人物传记，也是一部研究历史人物的专著，又是一部纪实作品，同时还具有某些“非虚构”的元素。我相信，很多读者看了这部作品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原来历史人物传记还可以这样写。

人物传记并不好写，历史人物传记尤其难写。对于小说家来说，往往会觉得现实题材难写。他们宁愿写一些至少在时空上与现实有一定距离的故事，因为这个距离，能让小说家获得更大的想象和虚构的空间。而写人物传记则恰恰相反。越是离现实近的人物才越好写，如果这个人物就在当下，也就更容易，因为所有的素材和真相都是现成的，只要你肯去了解，就摆在那里。历史人物则不然，时空越远，则研究、考证和打撈的工作越烦琐复杂。这一来，往往出现两种状况，或是写作者为掩盖研究不够深入和材料掌握得不足，为传记披上华丽的文学外衣，读起来似乎很地道，而如果细看，再细想，则如同雾里看花，这个被写的人物只是影影绰绰地隐在历史的迷雾中，连轮廓也很模糊；另一种，则是写作者把研究和考证的成果，就这样罗列起来，叠床架屋，貌似这些货真价实的材料可以让读者大快朵颐，而实际味同嚼蜡。

这部《王安石传》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作者显然是一位学者。但就这部作品而言，她的角色认知既是一个研究者，又是一个文学写作者。可以这样说，作者是以文学的方式对王安石这个本来就很意味的历史人物进行研究的，而她的研究成果，又是以文学的方式表达出来的，这就使这部历史人物传记既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同时又成为一部很典型也很出色的文学作品。作者也有很深的文学功底，所以叙述语言不仅有弹性，也有张力。同时在叙事上也收放自如，既有大而化之的讲述，使人感到人物所处的历史背景，同时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又有细腻的人物刻画及人物在当时的精彩瞬间乃至生动的对话。如此一来，不仅让这部作品有了故事性的人物关系，更具可读性，也让人感觉到距我们已有一千多年的王安石跃然纸上，呼之欲出，就这样活生生地站在我们面前，几乎可以感觉到他的呼吸。

毫不夸张地说，这部《王安石传》也为书写历史人物传记提供了全新的、宝贵的写作经验。而且也证明了一点：文学，或者说文学性、文学品质，不仅是历史人物传记的外衣或皮肤，更应该是坚实的“骨骼”。但是就传记这个特定的文体而言，对历史人物的文学书写与以历史人物为原型的虚构历史故事，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这里附带说一句，今天的很多“戏说”，尤其值得警惕。由此可见，这部《王安石传》的写作经验在今天是非常有借鉴意义的。



《王安石传》书影

底，所以叙述语言不仅有弹性，也有张力。同时在叙事上也收放自如，既有大而化之的讲述，使人感到人物所处的历史背景，同时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又有细腻的人物刻画及人物在当时的精彩瞬间乃至生动的对话。如此一来，不仅让这部作品有了故事性的人物关系，更具可读性，也让人感觉到距我们已有一千多年的王安石跃然纸上，呼之欲出，就这样活生生地站在我们面前，几乎可以感觉到他的呼吸。

毫不夸张地说，这部《王安石传》也为书写历史人物传记提供了全新的、宝贵的写作经验。而且也证明了一点：文学，或者说文学性、文学品质，不仅是历史人物传记的外衣或皮肤，更应该是坚实的“骨骼”。但是就传记这个特定的文体而言，对历史人物的文学书写与以历史人物为原型的虚构历史故事，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这里附带说一句，今天的很多“戏说”，尤其值得警惕。由此可见，这部《王安石传》的写作经验在今天是非常有借鉴意义的。

编辑手记

寻找历史写作新维度

从古至今，追溯、探究历史，传承中华文化，文学作品都是重要载体。通过阅读，后人感悟历史，修身明理，获取文化精神，受益无穷。当下，一些文学和影视作品中，出现了戏说历史、颠覆经典等不尊重历史的现象，虽博取了眼球、得到了关注，但却是急功近利、搬弄、消费历史资源，背离了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因此，如何写好当代历史题材文学作品、讲好中国历史故事，十分值得探讨。

本版今日刊发的两篇文章《如何恰当书写历史》和《历史人物传记的“骨骼”——〈王安石传〉写作启示》围绕这一议题讨论。前者从写作经验出发，告诉

我们要用文学手段对客观历史进行再创造；后者针对具体的文学作品，指出如何在硬邦邦的史实和生动的文学表达之间寻求平衡统一。两篇文章都表明，好的历史题材文学作品应是兼顾历史真实性与文学性、挖掘历史闪光点的产品，这也是我们对于历史写作的态度和选编两篇文章的理由。

这些文学探索，体现了创作者尊重传统、尊重生活、尊重创作规律的良好作风，使历史写作呈现出新的维度与格局，写作经验值得借鉴。与此同时，我们也期待在历史写作这块丰饶的土地上，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

创作与社会审美

陈亚军

人们的活动及人性状态是离不开社会的：它呈现在社会生活、活跃于社会关系、变化自社会发展。所以说，文学创作者的社会审美追求，就是认真严肃地考虑作品的社会效益，把握社会本质、人学本质和审美本质的有机统一。

社会进步与发展，是文学创作的应有认知。我们正经历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以及宏大而独特的创新实践，里面有文学创作的细节，有人物命运的矛盾。有位著名作家说，在提供文学作品的同时，就等于呈现了一个社会文本。提炼主题于时代之变，萃取题材于中国之进和人民之呼。实践证明，创作具有历史意义的作品，需要敏感的、丰沛的、深刻的感受力，需要不被非主流现象所蒙蔽的洞察力和思考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文学创作的精神追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颂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在对社

会生活美的探索中，人的发展状况始终是核心。我们所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涉及国家、社会和公民三方面，它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反映了时代发展的丰富内涵，是构建社会文明的软实力。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新时代文学的核心价值追求，是新时代文学培根铸魂、展现新担当的重要内容。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文学创作的新时代视野。在我国，民族关系的特殊内涵就在于其社会性与民族性的高度契合：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嵌式社会结构，一是长期社会生活中全方位的民族交融。由此形成利益相关、情感相通的民族共同体的社会形态，成为激发社会活力和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新时代文学创作所追求和塑造的社会审美，内含于中华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的表现与弘扬之中，建立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上。这是构建民族团结进步的社会基础，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社会认同。

马烽成为知名作家后，经常有人问他：你几十年从事文学创作最深的体会是什么？或者有什么经验、诀窍？他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实实在在深入生活，到生活中获取素材。他在许多篇创作谈文章中，谈得最多的是深入生活问题；他在各种场合的发言或讲话中，反复强调的也是深入生活问题；他与中青年作家交往或者接待文学爱好者时，还是诚恳地奉劝他们千万不要脱离生活。马烽之所以如此看重深入生活，是因为他自有过切身的经验与教训。

1949年，马烽留在了全国文协创作组工作。当时，他经常听到有人贬低解放区作家的作品土气、没有艺术技巧。他自己也觉得既然进了城市，不妨改变一下创作路数，写写城市生活。于是，仅靠道听途说，以失足妇女为题材，写了一篇短篇小说《红姑娘》。这篇作品既属臆构，失败也成必然。前辈作家丁玲和一些文友善意地提出批评，劝他坚持写自己熟悉的农村生活。马烽接受了大家的劝告，把写《红姑娘》作为深刻的教训，一生都没有忘记。从此，他再不去写不熟悉的题材了。

马烽在创作前，如果没有去他熟悉的农村与农民生活一段时期，没有把自己的感情同农民的心灵融会贯通，就会感到不踏实，写出的作品总是不满意，或者是失败之作。多年来，他一有机会就去农村走走。他不用记者采访式的方法，总是把自己当作农民中的一员，同干部们研究工作，同大娘大嫂们拉家常，同小伙子们说笑话，甚至还调解家庭纠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骑自行车，带着行李卷儿，走到哪里就住到哪里，同养房、土窑洞、工棚、破庙都住过。农民从不把他当作作家、当外人看待，亲切地称他“老马”。为了更好地体验生活，他曾到汾阳县挂职当过两年县委副书记，获得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他对这段经历念念不忘：“1958年前后，我在一个县里担任了2年县委副书记，虽然是个客串书记，但有一些问题也不能不管，担子压在肩上，你也就不能不去过问。实际上也就是工作逼着你去熟悉人，去了解生活。而且那时候我年纪还轻，身体也好，下乡经常是骑着一辆自行车，带着行李卷儿，走到哪里就住到哪里。到水利工地上，和民工们一块住破庙，滚草铺，也是常有的事。”（马烽：《三十年创作小结》）

正是有了这段经历，两三年功夫，马烽写出了十几篇小说和电影文学剧本，如《一篇特写》《四访孙玉厚》《三年早知道》《我的第一个上级》《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包括续集）等。其中几个作品轰动一时，在读者中的反响非常大，几十年以后也仍然留在许多人的记忆中。文艺评论界对马烽这个时期的创作也非常关注，许多权威评论家发表了颇有见地的文章，比如茅盾先生对《三年早知道》《我的第一个上级》都有评点；宋爽、思蒙、阎纲等人，对马烽的整体创作或单个作品有长篇专论或新作短评。应当说，马烽的这些创作实绩，在当时的文坛是非常突出的，在他个人创作生涯中也是辉煌的时期。他与赵树理、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在这一时期的作品，是文学界的一个热点，也是后来人们称他们为“山药蛋派”的重要依据。

新时期以后，马烽年岁大了，他不再骑自行车，坐上了汽车，但他发挥汽车的优势，尽量多跑一些地方，多接触一些人，真正了解农村中存在的问题和农民的思想。1978年，北京电影制片厂约他和孙谦写一部反映农村题材的电影文学剧本。于是，两人又像过去一样，结伴下乡，感受生活。他们跑了山西省的交城、文水、汾阳、临县、榆次、平等县，广泛接触农村基层干部，走访社员群众，实地考察好几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地。结合几十年来对农村生活的了解，两人经过深思熟虑，写出了反映县委书记朱克实拨乱反正、解决冤假错案、大抓农田水利建设故事的电影文学剧本《新来的县委书记》。剧本改名为《泪痕》拍成电影后，举国上下轰动一时，差不多家喻户晓，获得了当时的各项电影大奖。这部电影表现广大干部和群众在那个特殊年代展开的各种形式的反抗与坚决斗争。主人公、县委书记朱克实，是一位敢于为人民群众撑腰做主、敢于同歪风邪气坚决斗争、脚踏实地、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干部，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愿望。

上世纪80年代后期，马烽作出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葫芦沟今昔》。他在下乡时发现，当时大多数人对于责任制之前的农田基本建设持全盘否定态度，不愿承认责任制以后一些农民的富裕正是建立在基础上的，结果使本应用于经济领域的农业生产又落入了政治窠臼。马烽对此问题认真思考一番，就有了《葫芦沟今昔》的构思。他在这个小说中，用当代意识和历史态度观察上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发生的变革，在现实与历史、局部与全局、表层与深层的有机统一中，揭示农村改革的某些本质问题，希望人们正确认识和理解一些已经成为历史的事件，比如“学大寨”时期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有些工程确实是劳民伤财，有些工程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像葫芦沟那时候搞的治理乱石河滩工程，就是那个年代走上富裕路的基础。

③

